

# 论长江三峡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

杨 华<sup>1</sup>,刘自兵<sup>2</sup>

(1. 三峡大学 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宜昌 443002;

2. 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学报》编辑部,湖北 宜昌 443002)

**摘要:**三峡地区是亚洲人类诞生的发源地,新石器时代,这里有着著名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夏商周时期,这里是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战国以后的历朝历代,这里又是兵家必争的主要地区。因此,对三峡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自古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随着近些年来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一批批新材料的问世,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拓宽了视野,而且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也不得不使我们对过去三峡历史文化的一些传统观念及模糊不清的疑难问题重新来进行修正和改写,从而能让一些研究者、广大人民群众对三峡历史文化有一新的认识。

**关键词:**三峡;历史文化;巴人;楚人

**中图分类号:**K29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6-0003-05

早在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开始,人类就开始在三峡地区活动了,续后发展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至明清时代,三峡地区的原始人们世代代都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同大自然进行革命,并以她们的聪明才干和实践经验从而谱写出了辉煌的历史篇章,创造出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本文主要立足在文献学的基础上,再结合三峡地区地下考古发现资料,拟将三峡沧桑变换的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等,按其时代序列简略叙述如下。

## 一、史前时期

早在距今200多万年前,人类就开始在三峡地区活动了,巫山县龙骨坡发现的“巫山猿人化石”及洞穴居住遗址即是人类在三峡地区活动的历史开端。在巫山县龙骨坡不仅发现有人类化石,而且还发现有当时人类进行加工过的石器。可以想象,当时居住在龙骨坡的人类,他们以石器为工具或武器,开始同大自然进行了革命,在斗争中改变自然界,同时也改变了自身,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三峡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晚期的遗存基本上都有发现。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三峡地区开始进入到了以妇女为中心的母系氏社会,考古学文化中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这时期的人类已基本上从山洞逐渐移居到三峡地区长江及支流沿岸的山前台地和缓坡地带活动了,人们聚集而居,在这些村落里已开始有了房屋,人们利用江边上的砾石修理石器,由过去打击制作粗糙的石器逐渐摸索发明了磨磨出较精致的石器。开始制作陶器。磨制石器,陶器的出现,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迈进的重要标志。

三峡地区地理环境特殊,这里的劳动人民,在旧石器时代时主要以狩猎和采摘为主,到了新石器时代,除狩猎和采摘

外,捕鱼业也要占一定的位置。在三峡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诸遗址地层中出土有不少用于狩猎、捕鱼的工具,如从出土的石箭镞、骨镞等来看,可以说明已有了射杀性的弓箭,弓箭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的又一创造发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参见长办考古队:1973、1974年宜都红花套遗址发掘资料)

三峡地区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址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主要有石锄、铲、镰等,1979年在中堡岛遗址发掘的250平方米大溪文化地层中出土用于农业生产工具多达3000余件。在不少遗址地层中都发现有较多的猪、狗、牛、羊等家畜动物骨骼,有的陶支座还特别制成猪嘴形,宜都红花套遗址大溪文化陶器的陶胎中、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中见有稻壳和稻秆遗迹;出土的彩陶片上有的还描绘出谷穗纹(参见长办考古队:1973、1974年宜都红花套遗址发掘资料)。在枝江关庙山遗址发现一座大溪文化房址(F22),房址墙基见有用稻草壳加黏生土抹平表面的遗迹<sup>[1]</sup>。不仅如此,在宜都城背溪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地层中出土陶器(片)上也发现有稻壳痕迹<sup>[2]</sup>。

这些考古发现材料证明: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的原始人们已从过去那种游牧生活逐渐过渡到选择在较理想的地方进行长期的居住,农业种植业有了一定的发展,西陵峡的东部地区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就开始了栽培水稻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稳定的居住地,农业种植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从而这又促进了家畜饲养业的发展。

## 二、夏商时期

夏时期,在三峡地区活动的人群主要是巴族,按战国著作

《禹贡》中的说法,三峡地区大体属荆、梁二州。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威鸟,威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知的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的较早的文献记载,同书《大荒西经》中记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抵……。”《海内南经》中记云:“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孟涂)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丹山、丹阳其地都在巫峡和西陵峡地区。上述记载可算是对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较早的文献记载了。由此可见,夏代时,三峡地区的巴人与中原华夏族已有了密切的联系。

对于巴人起源的问题,文献中多记载其祖先是“廩君”,尤其是自汉以来,无论是正史,还是佚史中都有不少的记载。据《世本·氏姓篇》中记载:“廩君之先,故出巫诞。”这是说在廩君之先还有“巫诞”族。而所谓“巫诞”的“巫”字,这多是指巫山地区,应劭谓:“夷水出巫,东入江”。夷水(指清江)其上游连着川江(今重庆)的群巫之地,这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有明显记载。廩君巴人在夷水活动的历史,考古发现资料中已有证实,如在长阳渔峡口发现的香炉石遗址,就是一处非常典型的夏商时期的巴人遗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有关历史文献中记载,再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等都一致认为:香炉石遗址应是廩君巴人遗址。从长阳香炉石遗址地层中出土文物获知,时代包括有夏、商、周时期,如此看来,廩君巴人所处时代当在夏代<sup>[3]</sup>。

这一时期,三峡地区有较多的原始部落群体在这一地域里活动,如廩君在长阳渔峡口地区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时,廩君部落曾战败了其余四个部落以后才登上了首领位置,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海经》中记载,远古时期在长江三峡地区,有若干个群巫原始部落在这一区域里活动。从考古发现的资料可知:相当中原夏时期的文化遗存,在三峡地区已多有发现,这些遗存应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早期巴人遗址。

经先前夏代巴人在三峡地区的经营,到了商代,发展更加迅速,这一历史时期的巴人,东面与两湖地区的民族联系密切,西面又与古蜀国民族友好交往,北面的汉水上游地区也是巴人活动的范围。近年来,西北大学考古系对汉水上游的城固宝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遗址的商代地层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其中有很多陶器的器形、制作风格、包括纹饰等都与三峡地区(尤其是西陵峡地区)同时期陶器相似。据此,考古专家认为,宝山遗存应属于巴文化的性质,城固宝山应是商时期巴族在汉水上游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区<sup>[4]</sup>。这说明,商时期汉水上游曾是巴族的活动地。

三峡、鄂西、汉水上游地区巴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中原殷商帝国的密切关注,为了能统治巴族,殷商王室曾多次派军队南下征伐,河南殷墟甲骨卜辞中屡载有当时商王武丁南征巴方的历史事件。如“壬申卜,争,贞令妇好从沚盾戈伐巴方,受又!”<sup>[5]</sup>再又“贞王勿佳妇好从沚盾戈伐巴方,弗其受有又!”(《殷墟文字丙编》第313页),这些都是记载当时商王朝南下征伐巴方的史实。商代末年,西边周族的武王亲自率领的联合队伍东征“伐商”(历史上称“伐纣之役”),队伍中就

有巴人军队参加,据文献中记载,巴人军队在伐纣战役中表现的相当出色,巴人师旅作战,步调一致,阵容严密,动作整齐,前后呼应,进退有度。史籍中屡有所谓“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sup>[6]</sup>,记载的就是当时巴人军队在作战中的历史场面。

近年来考古发现资料中还获知:在万州塘坊坪遗址的夏时期文化堆积层中发现有小件铜器和铜矿渣,另在三峡地区其他一些夏商时期(主要是商代)遗址中也发现较多的小件铜器及冶铸铜器之后遗留下来的铜矿渣,这表明,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已开始有了冶铸青铜器的历史。经济方面除了以捕捞、狩猎以外,已开始有了对水田的栽培技术,如在万州中坝子遗址商时期文化层中发现有水田遗迹<sup>[7]</sup>。这是截止目前考古在峡江地区发现最早的水田遗迹。

### 三、西周时期

西周时期,三峡地区仍基本上是巴人活动的范围,因巴人在殷末参加了周武王伐纣战役,并立了大功,故周王室分封巴为姬姓诸侯国之一。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巴志》中载:“武王即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指的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封宗姬,建姬姓巴国一事,《正义》中在解释《左传·昭公九年》周詹桓伯所说:“及我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毫无疑问,西周时期巴国已为名副其实的诸侯国了。这时期巴国的国都可能在重庆市渝中区的下半城。《汉书·地理志》中曾云:“巴郡,故巴国”,《左传·桓公九年》杜注:“巴国,在巴郡江州县(今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

约自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北方中原发展而来的楚国,先在鄂西北的荆山一带立足,《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春秋晚期右尹子革曾对楚灵王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这意思是说,约西周初年,楚在鄂西北荆山一带活动的事情,那时楚国的疆域仅只是“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同:杜预解释“方百里为一同”,由此可见,西周初期楚国的疆域还很小。经熊绎六传至熊渠时,已拥有了大片的土地,如《左传·襄公六年》记载:“江、汉、沮、漳、楚之望也。”这时期的疆域其地包括长江中游至汉水,鄂西地区的沮漳二水也是在楚国版图内,由北至南,纵横千里,由东向西跨越也达千里之余。这时期的楚国为了继续扩展疆土,首先考虑的就是西部的巴国。于是,楚人沿着这条天然的长江要道开始向西征伐巴国。

到了西周晚期时期,楚国的势力已日益强大。经过近百年楚巴双方在西陵峡地区的交战,最终,整个西陵峡地区包括清江中、下游地区等皆被强大的楚国占领,除巴人逐渐沿江向巫山以西地区迁徙外,原活动在三峡东部地区的夔子国、庸国以及一些小部落等皆都臣服于楚国了。

古时候的三峡地区是我国盛产食盐的重要地区,历史地理学家任乃强曾研究指出:“四川盆地(包括三峡地区)原是侏罗纪内海,沉积有近两万万年的盐质,其上部的白垩纪岩层,亦还夹杂有部分盐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我国古代不少文献中都对三峡地区产盐的历史有过载述,如夏商时期活动在清江中游地区的廩君部落为夺取清江中游地区的盐业基地,曾与原来在这里控制产盐基地的盐水(夷水)女神部落进行过格斗,最后将盐水女神战败,控制了整个清江中、上游地区的几处产盐基地。在三峡地区的忠县、云阳、奉节、巫山、巫溪等地古代劳动人民开采过的“盐井”遗迹多有分布。近年来在

忠县哨棚嘴、中坝等遗址商末至西周时期的堆积中出土大量的尖底杯,数量占所出陶器总数的80%以上。据研究,这种尖底杯多与当时煮盐有关。由此可见,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对盐的认识及开采是具有着悠久历史的。

#### 四、春秋、战国时期

这时期的巴国以重庆市(江州)为政治中心,其疆域大体是,北接汉中,东到奉节,南至贵州北部,西达宜宾。经先前商、西周先辈们的着力经营,同时巴国又吸收了大量楚文化的新鲜血液,北方中原秦文化也对巴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急剧膨胀,军事武装势力更加强盛。为了对付东面的楚国入侵,巴国特在清江中游、瞿塘峡西口派重兵设防,《水经注·江水》中记载:“昔巴、楚数相攻伐,险置关,以相防捍。”又《华阳国志·巴志》载云:“巴、楚数相攻伐,故置扞关,阳关及沔关。”

巴、楚两国民族间的文化交往密切,历史悠久,又互婚姻,史籍中记载:“战国时,尝与楚婚”<sup>[8]</sup>即指此。但两国之间又时干戈相见,这也是事实。如春秋时楚武王曾联合巴师征服了汉水流域的各诸侯国,《左传·桓公九年》载:“楚使斗廉帅师及巴师围鄢,邓养生易、耳冉、生易帅师救鄢……邓师大败,鄢人宵遗。”又《左传·庄公十八年》记云:“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楚庄王时,又联合巴师灭掉庸国。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围鄢”。战国时期,巴国内部曾一度发生内乱,矛盾激化,巴国派出蔓子向楚求援,楚国出师帮助巴国平息了内乱,《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巴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史记·楚世家》中记载,楚肃王四年(公元前377年),巴蜀联军伐楚。取兹方(湖北松滋),于是楚为捍关以拒之。战国中期,楚已将势力扩展到了瞿塘峡以西地区,在奉节、云阳、万州、忠县、涪陵等地都发现有成批的楚墓。如在忠县一墓地中,清理出战国中期的楚墓多达30余座,墓葬内一般都放置有作战兵器,这表明,这些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当时楚国的远征军,他们在与巴国交战中身亡后葬入此地的。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遂又征夜郎,至滇国。总之,这时期,巴国遭受到了楚国致命的打击,使得巴王室由丰都、涪陵、重庆、合川,而至阆中的不断迁徙,也就是楚不断进迫的结果。”<sup>[9]</sup>可以这样说,当时巴国南半壁江河基本上都被楚国占领,唐《十道志》载曰:“楚子灭巴,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这是说,该地区的巴人多数逃窜到了湘西地区。

三峡地区居住着若干个族群和种族集团。这些“族群”和“种族集团”被中原华夏民族称之为“蛮民”。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有濮、賁、苴、共、奴、獯、夷、之蛮”。在这些民族集团中,集团有大有小、势力有强有弱,象巴县冬笋坝、云阳李家坝这样范围较大遗址、墓地,其居民可能是属于巴国的主体族群或种族集团,即可能是文献中记载的“廪君蛮”和“板楯蛮”<sup>[10]</sup>。居民姓氏,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目覃氏、相氏、郑氏”。这些姓氏在当时来说都是代表着一个民族群体的,这几大姓氏中又以巴姓者势力最强,其余四姓皆从属于巴氏的。

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三峡地区的劳动人民对盐业的开发以及制盐的技术等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不过,由于楚国不断向西拓展疆土,三峡地区的一些巴国的盐场也随之被楚国控

制。三峡地区巴国一些盐场的丢失,不仅使巴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等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也使得长期以来依赖于巴蜀地区供济食盐的北方秦国,其人民食盐的来源也被割断。自然,秦国为了解决本国人民食盐问题,这就不得不出兵与此时期占领着三峡地区盐场的楚国作战了。后来,秦国使者李冰(蜀郡太守)领导蜀地人民一起沿着三峡巫、巴先民开采泉盐的路子,受着其丰富的历史经验的启迪在蜀地广都开凿出盐井,加之此时期三峡地区也已被秦国占领,三峡地区盐场被秦国控制,这才使秦国人民食盐问题得到了缓和<sup>[11]</sup>。

历史再演变到战国中期末(前316年),北方中原的秦军(惠王)派遣张仪、司马错等首先灭掉了蜀国,接着,秦军又攻克了巴国的阆中地,挥师南下,“击夺楚巴,黔中郡”,巴国东部的楚国面临着强大的秦军入侵,也处于节节败退的状态中,于是,南面的楚“商于”之地(黔中郡)、北面的汉中、东面的巫峡、西陵峡等地区相继被秦军占领。从此,三峡地区的巴国、楚国与蜀国一样都归属于秦国统治了。

#### 五、秦汉时期

秦统一了三峡地区的巴、楚以后,在原巴国推行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制度。早在秦惠王后元(或称更元)十一年(前314年),秦就在原巴国地区置巴郡。如《汉书·地理志》记载:“巴郡,秦置。”《水经注·江水》记云:“秦惠王遣张仪等救直侯于巴,仪贪巴直之富,因执其王以归。而置巴郡焉,治江州。”在汉水上游秦置汉中郡。现在三峡地区的一些县(市)地名基本上都是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定名,只不过后来有的地名改了,也有的移居故地。如朐忍:后改名为“云阳”;枳县:后改名为涪陵;宕渠:后改名渠县;鱼复:后改名奉节;巴东、建始、恩施、秭归、长阳、宜昌皆属南郡。南郡即今江陵。巴东:秦汉属南郡巫县;建始:秦属黔中郡,汉属南郡;恩施:秦汉属南郡,三国及晋属建平郡;利川:周时属巴国地域,秦时属黔中郡;汉时为南郡蛮地;秭归:秦置秭归县,属南郡;长阳:秦属南郡,汉置假山县,随开皇八年(588年),改假山为长阳县,唐时改长阳为长阳;宜昌:古称夷陵,秦汉时属南郡。东汉末年,过去的州由监察区演变为政区,于是形成州、郡、县三级制。这时期的三峡地区分属于荆、益二州。荆州管辖为南郡,益州管辖为巴郡。

汉代,三峡地区的人口增多,据《汉书·地理志》中记载大致上可知:西汉元始二年,三峡地区的人口约为506 019人,人口密度约为5.4人/平方公里。东汉时期人口大增,据《后汉书》卷32、卷33《郡国四》、《郡国五》中记载大致上可知:东汉永和五年,三峡地区的人口约为694 955人,人口密度约为7.22人/平方公里<sup>[12]</sup>。这一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直接受到汉政府(中央)的管辖,故多有汉族官员,人民移居到三峡地区。如在宜昌前坪西汉墓地中出土有数枚“许氏”家族的印章,这些许氏家族墓葬皆集中而葬,有的占居着一个山头。许氏当由中原地区移居而来。此外,汉政府也曾将巴蜀地区人民迁居异地,如汉高祖时,高祖为了平定关中地区,曾征发巴蜀士卒迁于商洛地区。东汉时期,汉政府从三峡地区向江夏徙置大量人口,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至建武二十二年(46年)南潯山蛮雷迁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将军刘尚将万余人讨破之,徙其种人七千口置江夏界中,今(东晋)沔中蛮是也。”

两汉时期,三峡地区逐渐纳入到祖国大统一的汉文化洪

流中。从秦始皇至西汉末,三峡地区基本上是处在一相对稳定时期。然而,到了东汉时期,三峡地区发生了两起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

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公孙述在成都自立天子,国号“成”,号称“白帝”,据蜀12年,长江上游皆为公孙述直接管辖,这期间,公孙述数次使将士东出三峡,建武九年,公孙述派田戎及大将任满、程汎带领数万大军顺江东下与人前来伐蜀的汉军在酉陵峡口东面的荆山、虎牙山一带设防。后遭到汉军岑彭所部打击,蜀守军任满被斩,程汎被擒,田戎率残余退到江州。东汉大军入江溯长江、岷江而上,直抵成都,经长达近两年的征战,于建武十二年十一月,蜀公孙述战败而亡。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吴孙权所部夺取了荆州,蜀汉大军从樊城退兵,部下将士多归降于东吴。蜀汉关羽率残部退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部)。同年底,麦城被吴军重重包围,迫使关羽从麦城突围,向西北方向逃窜,在回马坡(湖北省远安西南)被吴军俘虏杀死。章武元年(221年),刘备所部为夺回荆州,替关羽报仇,亲率大军由川东东下征讨孙吴。次年二月,进兵夷陵,在猇亭与吴对峙,吴陆逊利用火攻取胜,刘备则退到奉节白帝城,后(223年)病死于永安宫。

这一历史时期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较多,其中两名女人物最值得一提。一是秦代巴郡人巴清,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矿业家,女实业家。主要开采丹砂(一种水银矿),是三峡地区首位暴发户。二是西汉南郡秭归(今兴山)人王嫪,字昭君。西汉元帝时宫女。王昭君为汉朝和匈奴的友好关系曾起到过重要作用。董必武称赞她“胡汉和亲万古传”。另还有东汉时期的严颜(时任巴郡守将)、甘宁(三国时曾任西陵·湖北麻城·太守、折冲将军)、董和(公元214年,被征为掌军中郎将)等皆是具有影响的人物。

#### 六、三国两晋至隋唐时期

东汉末年,在三峡东部地区的宜昌暴发了震惊中外的“吴蜀夷陵之战”,战争后,蜀汉政权收复荆州的计划彻底破灭,从此再无力东进了。于是,蜀汉特派邓芝出使东吴求和,并与东吴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北方魏国。这时期蜀汉政权的方针:一是向北“移镇汉中、出师强魏”;二是向南“征讨南中,安定四郡”。广阔的巴蜀地区在蜀汉政权的治理下,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上对蜀汉地区有“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的评述。自然,此时期的三峡地区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历史时期。

这时期的行政区划制度仍是州、郡、县三级制。整个三峡地区分属于吴、蜀两国管辖。其中的巴东、涪陵、巴郡为益州管辖,宜都、建平郡为荆州管辖。在贸易方面,吴蜀两国始终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两地经济文化交流也可以说是处在一个非常频繁的历史时期。此时期里值得提及的两件大事。

一是东汉末三国初,自荆州(江陵城)落入东吴之手后,北方曹魏政权也有一心想夺回荆州(江陵城)的意图。于是,特派出大将夏侯尚率大军与曹真共围江陵城,吴孙权赶紧派诸葛亮、杨樾与魏军夏侯尚所部在江陵城外西边的枝江百里洲(七星台处百里洲紧接着江陵城)处隔江对峙。吴诸葛亮令水军在百里洲上据守,魏夏侯尚将部数万人在其下流处渡江,攻击诸葛亮水军,并烧掉了吴军的舟船,水陆并进,把吴军打败。夏侯尚所部在百里洲尾(今鸭子口处)架设的浮桥,不仅

与岸边往来方便,而且也封锁了上、下过往的船只运输,使吴军无可奈何。吴军潘璋向诸葛亮建议,在浮桥上流50里处砍伐芦苇数百束,然后缚作大筏,这样顺流放火,一是可烧毁浮桥,二是可乘势发起攻击,出奇制胜,魏军必败。诸葛亮采取此建议后,果然将魏军浮桥烧毁,使魏军败退。这就是三国时期著名战例中的“百里洲浮桥之战”。

二是蜀汉延熙十一年(公元248年),涪陵属国(后改为涪陵郡)豪族之一的徐巨杀掉了都尉反叛,于是,后主刘禅派遣车骑将军邓芝前往征讨,平定了反叛后,责令徐、蔺、谢、范五千家迁往成都地区,以削弱地方豪族势力。

西晋王朝建立,晋武帝司马炎的统治地位的巩固,从而加速了统一天下日程。公元269年,参军王濬出任巴郡太守,在位期间,他不仅调整了政策,而且还提高了士兵的待遇和身份,深得民心,他领导的巴郡水军在作战时,英勇顽强,在灭吴战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公元279年,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广武将军唐彬率水军出三峡东下伐吴,吴军为了阻止王濬水军东下,特在西陵峡出口的荆门山一带用铁锁横江,此外还用铁锥暗置江中,拦阻王濬的舟舰。但最终被王濬攻破,于是,西陵、荆门、夷道等皆先后被王濬所部占领。

两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地方政区制度仍实行先前的州、郡、县三级制。其中属于梁州的有巴、巴东、涪陵郡;属于荆州的有建平、宜都郡。后巴东及其以西的涪陵、巴郡划为益州,建平、宜都郡仍属荆州。西晋末至东晋初,巴、巴东、涪陵郡先后入成汉之荆州,东晋初,瞿塘峡(鱼复)以西的三峡地区为成汉管辖,瞿塘峡以东的三峡地区为东晋管辖。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桓温定蜀以后,三峡地区又分为巴、涪陵、巴东、建平、宜都郡。其中巴郡、涪陵郡分属益州,巴东郡、建平郡、宜都郡分属荆州。

社会经济方面,据《蜀广记》卷64中记载:“三峡两岸土石不分之处,皆种燕麦。春夏之交,黄遍山谷,土人赖以充实。”农业耕种仍是刀耕火种,主要粮食作物有小米、豆类、稷等,水稻少量。另外,采摘、捕捞、狩猎仍占有一定的位置。农副产品丰富,据《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土植五谷,性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皆纳贡之。”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苡、蔓有辛蒟,园有芳蒟、香茗、给客橙、葵。其药物之异者有巴戟、天椒;竹木之瓊者有桃支、灵寿。”此外,酿酒业在这时期也很兴旺发达,其酒有誉名全国的“巴乡清”如《水经注·卷三十三·江水注》中记载:有“巴乡村,村人善酿,故俗称巴乡清郡出名酒。”纺织业也有很大发展,所产的巴人“襁布”、“巾家巾”不仅是当时人们所追求的高档产品,而且还用于赋税之资或上贡于朝廷及地方政府。

隋朝时期,在三峡地区发生了一起重要的历史事件此时期,隋文帝杨坚特派亲信大臣在奉节修造战船,训练水师,为东下伐陈作准备,战船可分为大型、中型、小型。大型战船(称“五牙”)可载将士800人;中型(称“黄龙”)可载500人;小型有“平乘”“舟乍”“艨艟”。隋开皇八年(588年),杨素率水师从奉节东下,先战灭了陈军的戚昕后又突破了陈军吕忠肃的陆路防线,陈在三峡地区设下的数道防线皆被隋军攻破,最后隋军出三峡乘胜直抵汉口。

隋末,江陵萧铣叛隋,自称梁王,定都江陵,拥将士多达40

万,占据着两湖及岭南大片地盘在江南一带具有一定的势力。武德二年(619年),唐高祖李渊欲讨梁以统一江南,此时期,萧铣派大将陈普环率水军沿江西上攻取巴蜀,行至西陵峡时遭到唐军时任峡州刺史许绍的阻击。陈普环被生擒。萧铣遂回师荆门、虎牙屯守。武德三年,唐军攻占虎牙。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军将领李孝恭、李靖率巴蜀水师乘2000余只战船,从夔州顺江东下讨伐萧铣,萧铣战败,在江陵被生擒,押至京师斩于长安。

隋唐时,活动在三峡地区巴族中有田、向、冉三大姓氏,据《旧唐书·李靖传》曰:“萧铣据荆州,(李渊)遣(李)靖安辑之,轻骑至金州(今陕西安康),遇蛮贼数万屯聚山谷。会开州蛮冉肇则反,率众袭夔州。”又《新唐书·杨思勰传》记载:“(开元)十二年(724年),五溪首领覃行章乱,诏思勰为黔中招讨使,率兵六万往,执行章。斩首三万级……。”这些都是记载唐初及盛唐时的历史事件。

隋唐地方政区制发生变化,由此前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郡)、县二级制。这时期里,三峡地区分属荆、峡、信、南、开、临、渝等州。唐开元以后,地方政区制又有变化,演变为道、州(郡)、县三级制。三峡地区分属有荆南道、山南西道、剑南东川道。五代十国,三峡地区地方政区制度基本上仍沿袭唐制。三峡东部地区自归州以东属南平(荆南),三峡西部地区自夔州以西先后属于前蜀、后唐、后蜀。历史再演变到了宋代,地方政区改为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制。

城镇建设方面。早在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沿江的一些平坝、岛、山前台地、缓坡地带居住,并形成了一个占地面积较大的聚落遗址,也正是分布在沿江地区的这些聚落遗址,从而为后来三峡地区城市、集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后三峡沿岸地区许多的城市、集镇大都是在先前一些聚落遗址基础上发展逐渐建设起来的。除长江沿岸地区外,另在长江支流上也分布有几座城镇,如北井县城,泰昌县城、汤溪盐场等即是如此。不过,虽说三峡地区城市、集镇之多,但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三峡地区的一些城镇占地面积都不太大。如隋唐时期三峡地区较大的峡州郡,郡址在今宜昌市西北下牢戎(溪),为一沿江而建的小城,贞观九年,从下牢戎移于今宜昌市。其人口,唐贞观年间,峡州郡人口近2万(据《旧唐书·地理志》)。再降至北宋时,峡州夷陵有“县民一二千户”(张忠民主编:《欧阳修夷陵诗文集注》(鄂宜图内字第60号)2001年第78页),其城池:“周长八百三十六丈、高二丈二尺”,也不过是一座小城市。城内人口也较少,人口不足二万。人口较少,故城池占地面积也和可想而知了。再如古渝州城,742—758年,渝州曾称为“南平郡”,后因这一地区僚民很多,故唐代又称之为“南平僚”,宋代又称之为“渝州蛮”。有关“南平”的历史情况,《新唐书·南平僚》中记载说:“南平僚者,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四千余。”户数及人口大致与峡州户数人口相当(《旧唐书·地理志》)。宋代以后,这一地区的居民除部分较偏僻的山区外,其他绝大多数地区都汉化了。

社会经济方面。这时期里的社会经济方面仍基本上与先前时期一样,渔猎、采集仍在生活中占较大的比例。农业种植

仍普遍采用传统式的刀耕火种,如《太平寰宇记·东湖县》记载:峡州“男子刀耕火种”。明代天一阁所藏嘉靖《归州志·风俗》中载述:“刀耕火种,以渔猎为业”,《石湖诗集》卷16《巴东峡口》:“照夜烧畲陇,绿云种笱山”,《舆地纪胜·涪州》中云:“其俗刀耕火种。”耕地面积、如万县地区仅人均耕地约为8.68万亩。人口有增加,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万县地区夔、万、忠、开四州有人口174139。农作物以黍稷、菽粟为主,水稻作物也占有一定的比例。经济作物主要有茶叶、苧麻、葛等。尤其是茶叶生产,是这一时期(指唐宋)发展的繁盛时期。

## 七、结语

三峡历史文化悠久,源远流长,然论及到对三峡历史文化的研究情况而言,虽说是自建国以来各学科领域里的研究者在为复原出三峡历史文化方面都作了很大的努力,成绩斐然,但限于自古以来各类文献史籍中对三峡地区的历史记载模糊不清,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历史情况更是支离破碎终究难以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而据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有关三峡历史文化方面的各类书籍可谓是堆积如山,但真正能将三峡历史文化较全面的、系统的反映出来的还不曾见到,尤其是三峡考古方面的材料还没有真正被利用起来,而在编写三峡历史文化方面,考古学发现资料又是最为重要的信据。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多是由考古学来解决的,然而,三峡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主要是近30年来的事,如今三峡地区的考古工作还正在抢救发掘之中,即使是近年来已发掘出的一些资料(尤其是重庆地区),绝大多数都还没有整理出来,其研究工作任务还相当大。因此,编写出一部较全面的反映出三峡历史文化方面的巨著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这一工作仍还任重道远。而本文对三峡历史文化的论述,这也只是一概要性的介绍,旨在于让大家对三峡历史文化有一粗略认识。

##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工作队.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第二次发掘[J].考古,1983(1):50-54.
- [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 [3]杨华.对巴人起源于清江说若干问题的分析[J].四川文物,2001(1):15-25.
- [4]西北大学文博学院.城固宝山[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 [5]郭沫若.殷契粹编[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 [6]刘琳校注.华阳国志·巴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 [7]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 [8]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9]罗二虎.初论晚期巴文化的类型: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 [10]屈小强、蓝勇等.中国三峡文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 [11]蓝勇主编.长江三峡历史地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